



The Approach to Medievalism

中世纪探骊

王云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Approach to Medievalism

中世纪探骊

王云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探骊/王云龙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214-23208-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史学—中世纪—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2680 号

书 名 中世纪探骊

著 者	王云龙
责 任 编 辑	史雪莲
装 帧 设 计	许文菲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页 1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3208-3
定 价	5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王云龙 1963年生,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9月至2000年7月,师从著名世界史学家朱寰教授,攻读中世纪史博士学位;2001年3月至2003年3月,入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为著名世界史学家钱乘旦教授;2003年3月至今,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工作,从事中世纪史和世界教育法治史研究,较早关注国际学术界新中世纪学研究,并介绍相关研究进展。出版著作、译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责任编辑：史雪莲
装帧设计：许文菲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	1
第二章	前维京时代北欧与欧洲大陆的联系	12
第三章	维京神话叙事特质的历史学解析	56
第四章	克利奥的萨迦——女性主义史学论域的维京妇女	71
第五章	欧洲史视域中文德十字军探析	83
第六章	波罗的海十字军文本学述析	94
第七章	中世纪文本的“恶罗斯”叙事解析	110
第八章	诺曼征服与英格兰民族认同的萌发——基于历史文献学的阐释	123
第九章	爱尔兰宗主主权之争：从《祝祷书》到《抗议书》	138
第十章	西方学术界关于英国封建制度“诺曼起源说”的论争述析	147
第十一章	穆斯林西班牙的文化成就	159
第十二章	圣维克托的休教育思想述析	175
第十三章	十字架上的嫁衣——论沙特尔的伊沃与教会婚姻法	192
第十四章	基督教语境中普世人权的发轫——兼论西方学者的人权发生学观念	204
第十五章	新中世纪学论域的欧洲犹太人问题	217
第十六章	中世纪主权概念三重语境解析	237

第十七章 德鲁伊特:凯尔特文化的标本 261

跋 266

外文参考文献 268

中文参考文献 277

第一章 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

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到“New Medievalism”一词,国内世界史学界对该词虽涉猎不多,但译名繁杂,亟待厘清。在西方学术界,“New Medievalism”一词出现频度颇高,但其语境特别是话语所指却是多元的,是以下三个论域的支撑性话语。本文对“New Medievalism”一词,在下述三个论域的汉译名,做一学术梳理,揭示汉语不同译名的学理规定性的不同。

一、作为“新中世纪学”的“New Medievalism”

在历史学论域,“New Medievalism”一词,汉译应为“新中世纪学”。在西方学术界,“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与“后结构主义中世纪学”(Post-Structuralist Medievalism)、新的中世纪学(Neo-Medievalism)等术语同义。何谓“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威廉·帕登指出:“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研究中世纪,关键之点是将其自身与现代性相区别。”^①新中世纪学全面解构了传

^① William Paden, “New Medievalism and Medievalism,” in *The Year's Work in Medievalism* 10, 1995, p. 233.

统中世纪史的知识体系,呈现后现代的学理面貌,与传统中世纪史有着代际性差异。

新中世纪学肇始于新历史文献学(New Philology),1989年,时任国立法语研究所所长的伯纳德·瑟奎里尼出版了《异本举善——文献学批评史》。^①这部著作全方位地解构了传统中世纪历史文献学,在欧美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荡与回响。20世纪90年代,西方中世纪历史研究主体进入到新中世纪学阶段,诺曼·康特的畅销书——《构造中世纪——20世纪杰出中世纪学家的生平、著作和理念》起到了标举新潮的学术作用。该书运用后现代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通过对西方20世纪著名中世纪学家们的生平、著作和理念的重新释读,得出结论:中世纪就是我们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却以繁复的多样性困扰着我们,迫使我们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为之做出取舍或至少是调整。尽管学理意义的中世纪与当下的差异相对不大,但却全力突出这种被学理构造出来的差异性。^②诺曼·康特认为,当下所言的中世纪,不是实时实然的中世纪,那样的中世纪是根本无法全然再现的,而是中世纪学专家构造的关于中世纪的学理体系,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世纪学家创造的、充满创造者学术旨趣与个性差异的中世纪。针对始于启蒙运动的“千年黑暗”的传统中世纪史界说,国际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费加罗报》发表文章,阐释新中世纪学的理念,指出:“何谓历史?历史是对诸社会变迁的研究。正如马克·布洛赫曾认为的那样,过去只有在阐明现在的范畴内,才有意义。对于中世纪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在我看来,中世纪是现代性诞生的长时段。这里,我要明确的是,中世纪并非像启蒙思想家和浪漫主义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蒙昧时代。19世纪针对政教分离的辩论,事实上对推动中世纪是文明进步的观念的形成做

① Bernard Cerquiglini, *Eloge de la variante :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hilology*, Paris: Le Seuil, 1989.

② Norman F. Cantor, *Inventing Middle Ages : The Lives, Works, and Ideas of Great Medievalists of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1, p. 47.

出了贡献。”^①雅克·勒高夫反对传统中世纪史的界说,坚持中世纪是西欧独有的建设性和进步的长时段。沿着后现代理念赅糅的新中世纪学的学术理路,1991年美国学者出版了的一部名为《新中世纪学》,内含导论和13篇论文,各位作者从中世纪研究的历史语言学、文本学和编年史等领域出发,从批评理论、中世纪历史与文本话语的跨学科的互文性学术视角,提出了新中世纪学与传统中世纪史不同的范式、方法与理念,初步形成了新中世纪学与传统中世纪史的代际规定性。^②1998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的中世纪学》一书,提出:中世纪史是“对中世纪文化的后中世纪的再创造”^③。新中世纪学是西方学者用当下的理念分析中世纪的学理体系。新中世纪学以复合论域研究为学术规定性,以中世纪千年历史为型构母题(Matrix of Episteme),通过学理路径的整合设置、学科范式的创新设定、学术话语的操作设计,在当下主流语境中,析解特定义题的历时性言说的语意差异,演绎作为复合论域的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的无法限定的丰富性。新中世纪学阶段性集成的标志,是2005年出齐的七卷八册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四卷分为两册),该著封底文字称本书为“这一领域历史学作品的里程碑,由国际一流学者撰写,体现了最新研究成果,是所有对中世纪世界感兴趣的读者的基本参考工具”^④。当然,该书并未囊括迄今西方学术界关于新中世纪学的所有研究成果和全部研究领域。

以上概括地梳理了新中世纪学的学术脉络与学理路径,接下来,必须对新中世纪学的否定性的前提——西方传统的中世纪学也做一要略性的述论,以便在整体学术史的背景下,更好地把握新中世纪学。在西方,传统的中世纪学发端于早期现代性阶段的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传统

① *Le Figaro Littéraire*, Decembre 4, 2003.

② Brownlee, Marina S., Kevin Brownlee, and Stephen Nichols eds., *The New Medievalism*,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

③ Richard Utz and Tom Shippey, *Medievalism in the Modern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Leslie J. Workman*, Turnhout: Brepols, 1998, p. 4.

④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的中世纪学是浪漫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学术结晶。启蒙思想家为了给新时代开辟新的道路,以理性取代神性,以科学破除迷信,以线性取代轮回,以进步破除天定。启蒙思想家秉持理性的绝对律令,运用科学的绝对思维,构造线性的绝对路径,笃行进步的绝对理念,中世纪就成为启蒙思想合法性言说的绝对否定的对立面。由于启蒙运动,“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界定就成为常识性话语。在启蒙运动的话语霸权主导下,中世纪成为线性进步、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中世纪自然地等同于蒙昧无知、落后腐朽。在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18世纪,理性主义遭遇到浪漫主义的挑战。浪漫主义进攻理性主义的主战场,就是应用人文学(humanities)的学理体系,构造反理性至上的中世纪学。

德意志兰的浪漫主义思想大师、文化民族主义与传统中世纪学[史]的创立者之一 G. J. 赫尔德(1744—1804 年)指出,传统中世纪学侧重“再现”,重在构造与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浪漫主义的中世纪意象,尤其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关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论断。赫尔德认为,中世纪与其说是历史的实在,不如说是历史的传奇。他从浪漫主义语境出发,把中世纪看作浪漫主义意象的源泉,中世纪是以“北欧骑士”为独特审美符号的历史时段。他写道:人们经常把“北欧骑士”精神与古希腊英雄时代相比较,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不具有可比性,[中世纪]是唯一的。中世纪是历史的独特形态,它的优长与缺欠之处,既不可与其前的时代相比较,又在其后的时代被无休止地改头换面,因而,中世纪是唯一的。我们阅读关于这一时期[中世纪]的著作,都集中于揭示它的黑暗面。每一位在我们这个世纪居主导地位的经典作家[指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都把整个中世纪看作野蛮、蒙昧、迷信、宗教狂热与极度匮乏充斥的时段。……[恰恰在中世纪]欧洲被构造完成了,……我只想指出[中世纪]是其后时代精神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源泉。^① 西方的中

① F. M. Barnard, *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12.

世纪学与中国语境中的中世纪史有着旨趣的差别,这种差别既是研究取向的差别,也是学术理路的差别。因而,研究新中世纪学,必须兼顾传统中世纪学,否则,将陷入学术话语的迷宫。

二、作为“新中世纪化”的“New Medievalism”

在政治学论域,New Medievalism 应汉译为“新中世纪化”。中国学术界将西方这一论域的“New Medievalism”,径自汉译为“新中世纪主义”。这种译名,只是用汉语把 New 和 Medievalism 简单地叠加译出,并未兼顾到“New Medievalism”作为西方学术言说的后现代语境,更遑论即使用“中世纪主义”,直译 Medievalism 也是词不尽义的。-ism 后缀,构成名词,主义只是其构成的众多语义的一种,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主要的一种。^① New Medievalism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是知识论的实在(Reality of Epistemology),不是本体论的理念(Idea of Ontology),故不应译为理念本体论的“新中世纪主义”,而应译做体现知识论实在的“新中世纪化”。

从词源学探究,慕尼黑大学的弗里德里希教授考证出,阿诺德·沃尔夫斯早在 1962 年一篇国际政治学论文中,就已使用了“新中世纪化”(New Medievalism)一词。^② 但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篇论文未引起多少反响。“新中世纪化”(New Medievalism)一词,也随之湮没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直到 1977 年英国政治学家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一书出版,才重见天日。西方学者公推布尔的这部作品在政治学论域,对“新中世纪化”(New Medievalism)一词,首先做出明晰的学理界定,以此来表述他所谓的现代世界“更为普遍的

① 张柏然主编:《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256 页。

② Friedrichs J., “The Meaning of New Medievalism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4 (Dec. 2001), p. 476.

暴力行为”。^① 布尔认为,这是从普世君主政体(最高权力属于教会和帝国)转变到由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构成的“新的封建形态”的必然结果。布尔在该书的第 11 章,用“New Medievalism”(新中世纪化)做一节的标题,指出:新中世纪化是“一种现代的、世俗的,与存在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某种普世的政治组织的对应物。在那样一种体系中,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或国家在治理某一部分基督徒的意义上拥有主权。每一个统治者或国家都必须与其下的诸侯和其上的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享权力”^②。布尔从区域一体化、民族国家的消解、个人使用国际暴力、超国家组织和经济技术全球化等五个方面,来论证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有可能被类似于中世纪基督教普世建制的“新中世纪化”取代的趋势。^③ 这部著作奠定了布尔作为国际政治学英国学派代表人物的学术地位,他的“新中世纪化”理论在“后冷战”,特别是“9·11”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天主教大学校长、政治学教授洛伦左·奥尔尼契在 2004 年 10 月的一次访谈中,针对“新中世纪化”,指出:根据布尔的看法,12、13 世纪与我们的时代存在一种互逆的关系,从那时到现在由一种普世体系(多元合法性体系、地方性权威网络,这两者最后都从属于两个最高权威——教皇和皇帝)转变为民族国家体系,现在则呈现一种方向转变,民族国家正在把部分主权让渡给普世的多边体系。21 世纪新的类似于中世纪基督教普世建制正在形成,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带有普世建制的职能。^④ 但是,对于“新中世纪化”理论,西方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安妮-玛丽·施拉特指出,新中世纪学者声称民族国家终结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两个关键点。第一,非民族国家力量并不是民族国家

①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179.

②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254.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 255 - 256.

④ www. 30Days in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的替代者；第二，力量转移并非“零和”对局，非民族国家力量增强，并不等于民族国家力量的丧失。民族国家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自身的功能性存在。^①“新中世纪化”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表征民族国家的终结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中世纪附会，而非本体论范畴的中世纪归来。

三、作为“新中世纪性”的“New Medievalism”

在公共性论域，New Medievalism 应汉译做“新中世纪性”。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和多领域专家用“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即“回到中世纪”(Return to the Middle Ages)来指称现代世界的弊端，如“鼠疫”般可怕的埃博拉或 SARS 病毒，体罚与酷刑，城市犯罪，财富分配不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战争等。在西方公共性论域中，中世纪一词仍然是启蒙运动的语境，等同于蒙昧，甚至罪恶、不宽容、压制知性。公共性论域的“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与历史学论域的“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的语义完全相反，这表明，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知识进步并没有彻底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和公众的知性共识，公共性话语处于代际性时差滞后。

西方公共性论域的现代性，从启蒙时期开始了由精神到制度，再由制度返回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启蒙运动牢固地确立了线性的时间维度的进步观，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自洽的现代性话语霸权体系。公共性论域的现代性，首先是世界历史的界定符号。世界历史过程，是辩证的演进过程，是人类主体性发现的喜悦与付出的巨大代价交织的悲欣历路。现代性伴生的巨大不幸，是由于其自身合法性的源泉——理性的绝对主义所导致的。启蒙时代，人们用理性的独断性与绝对性取代中世纪的基督教神性的独断性与绝对性，认为凭借理性，人类可以无所不能，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世界历史作为人类社会与文明

^①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Sept. 1997), pp. 183 - 197.

进程的一个普世性阶段,首先是一个历史哲学的命题。只有从历史哲学的智慧制高点俯视,才能厘清世界历史与其前人类历史的区别与差异。黑格尔是第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界定世界历史的哲学家,他认为,绝对理念或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基础与本质,这种精神或理念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为“自由意识”。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自由不同于“任性”或偶然的“意志”,自由的本质是征服形式上偶然的“意志”。自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对偶然“意志”与任性的扬弃,决定了各个地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无论其本质与形式的存在样态差异多么巨大,都必然步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黑格尔指出,作为世界精神体现的本质,即自由意志,需要经过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才能够意识到。人类只有意识到了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黑格尔以“自由”为轴心,勾勒出了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系谱图:东方专制主义各国自古以来,只有专制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只有部分人,即公民是自由的,其余人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日耳曼世界,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黑格尔认为,体现为世界精神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大致与太阳的行程相同,太阳升于东方,落于西方,历史演进为世界历史也大体相似。历史始于东方诸国,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中经希腊罗马,终于日耳曼世界。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运动进程,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在世界历史中演化为一系列发展阶段,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精神。特定的民族精神在这个民族的文化、政治制度、宗教、伦理、道德、风俗、法律、科学、艺术等一切方面展现出来。世界历史的进步,就是通过一系列体现为特定“民族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来实现的。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只能创造一次历史,以其为标志的新境界。这个创造历史新境界的民族,就被称作“世界历史民族”,在世界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时期,就是居统治地位的民族。

西方现代性线性理性思维认为,从社会转变维度展现,是前现

代——现代性取向的现代化(正题)——反现代性取向的现代化(反题)——后现代性(合题)。这样,社会转型终于后现代性。这是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从开端到终端的逻辑展示,因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因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欢呼“历史终结”。他的语境是黑格尔式的。他是基于冷战结束,全球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两方面被资本主义覆盖这一主观判断,认为表现为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异质性世界历史,结束于资本主义同质性的世界。因而,他提出“历史终结论”。事实上,冷战结束,没有终结世界历史,而是把世界历史的异质性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展现出来,即在文明的维度上,以更加不可调和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世界历史的文明变迁进程,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更加曲折与漫长。世界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止步于冷战终结,相反在后冷战时空更加异质性的文明冲突与认同危机中蹒跚前行。西方的公共性论域中的“新中世纪性”是“历史终结论”破产的直接写照。破解后冷战全球性难题的金钥匙,在于具有世界历史纵深感与穿透感的哲学智慧,并把这种历史哲学智慧富含的精神资源存量,加以当代化重组,使之成为破解现实困顿的智慧增量。现实问题的底蕴,在于世界历史深层次的纠葛。离开现实的世界历史,与离开世界历史的现实,在 15 世纪世界历史形成以后,都是无法想象的。世界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精神的物化与物化的精神辩证统一进程,世界历史是现代性文明的外在化进程,同时,也是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文明角逐的过程。离开精神规定性的文明是没有的,世界历史从本质化的角度来看,更是精神的物化与物化的精神冲突的过程,只是仍看不到这一精神领域冲突终点在哪里。

在公共性论域,“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作为反启蒙思想的表征,获得了反理性、反科学、反现代性的界定。加利·威尔斯把小布什赢得 2004 年美国大选胜利,称为“启蒙思想的终结日”,是美国“放弃启蒙价值观的结果”。针对宗教信仰成为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的决定性因素,威尔斯质疑道,“一个相信上帝创世,而不相信进化论的国家

还能被称为是进步的国家吗?”他认为,布什政府是新中世纪性统摄美国的产物。^①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04年11月号的一篇文章,引用2001年2月盖洛普专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千个接受电话访问的美国成年人中,接近45%的人相信,上帝在一万多年前创造了人类,进化对于人类的形成没有起什么作用。^② 塞尔维亚教育部长宣布,从2004年秋季开始的学年,国立学校将不再教授达尔文进化论。^③ 进化论既是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也是现代性的支撑性意识形态,更是科学至上的合法性理念。解构了进化论,也就解构了启蒙运动开启的线性进步的科学观念,崩解了建基于理性之上的现代性。这是秉持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和多领域专家所无法接受的,但却是北美和欧洲的现实存在。以“后现代”为包装的“新中世纪性”,正在这些地域大行其道。

当下西方正经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的社会转型,这种全方位转型是人类发展的质的跃迁,公共论域是社会转型的精神前提,也是社会转型的智力保障。公共论域离不开社会转型轨迹的积累性推进。只有这样,公共论域才能在社会转型变迁轨迹与切片化事件点相遇,引发质的变迁的显象化。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而公共论域的基本方法论是对照比较,即在一现象原生与次生形态之间进行同一参照系中的异差比较,来论证一个直观的结论,即次生之所以为次生、原生之所以为原生。进入到21世纪,公共论域试图通过切片化方法,在次生与原生的既定格局基础上,以特定时段的特定地域的特定事件,发现超越原生与次生界定的可能存在的类同性。这仅是话语构造中的可能性,而非史实砌构中的类同性。但这正是公共论域,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磁力所在,超越实证科学和经验性学科的所谓科学精确,把人的历史还给人文思维领域。西方公共论域中的“新中世纪性”,正是这样一种话语范式。

“新中世纪性”在逻辑的时空四维学理构造中,按照尺度的尺度设定

① Garry Wills, “The Day the Enlightenment Went Out?” *New York Times*, Nov. 4, 2004.

② David Quammen, “Was Darwin Wrong?”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Nov., 2004.

③ *Daily Telegraphy*, Sept., 10, 2004.